



圍棋與戰略：中共戰略文化研究途徑探討

副教授 吳建德

提 要

1970年代西方學界逐漸盛行以戰略文化作為戰略研究的途徑，此一風氣也逐漸蔓延至中國(特別是中共)戰略研究領域，近年來甚至流行以圍棋作為研究北京地緣政治策略的研究途徑。本文主要目的即在於藉由戰略文化研究的相關文獻探討，分析中國特有戰略文化內涵，並進一步審視「圍棋觀」的主要論點，及其在研究方法上所遭遇的困境。

關鍵字：中共、戰略文化、研究途徑、圍棋

前 言

2014年12月，在中國大陸正式拒絕菲律賓針對南海九段線所提出的國際仲裁案後，美國學者武溫(Alexander Vuving)在國家利益網站(National Interests)撰文指出，北京在南海所進行的是一場與西方思考極為不同的圍棋策略。此一策略顯示，大陸正逐步搶占南海戰略要地並強化與擴大所擁有島嶼的面積與設施，如此一來北京將得以逐步蠶食整個南海海域。接著，武溫針對大陸的圍棋策略向美國政府提出對應的政策，化解此大陸在南海所導致的紛爭與威脅。¹武氏此篇文章一

經披露，立即被兩岸媒體所介紹與引用，顯示出南海爭端所引發周邊國家憂慮程度；更重要的是，在中共不透明的政策之下，周邊國家與美國隨著大陸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與區域軍事強權同時，對於瞭解北京政策與戰略規劃的高度需求。

類此以圍棋為研究途徑的戰略文化研究提供戰略研究的新角度，誠如葛瑞(Colin S Gray)所言，戰略文化研究有著較為深刻的文化理解、辨別政策動機與預測可能行動的能力、相互溝通的能力及評斷對方事件意義的能力。²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從戰略文化角度作為研究北京政治、經濟與軍事的取

1 有關武溫的觀點，參見Alexander Vuving, "China's Grand-Strategy Challenge: Creating Its Own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National Interest, Dec. 8, 2014, website: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s-grand-strategy-challenge-creating-its-own-islands-the-11807>

2 Coline S. Gray, "Strategic Culture as Context: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ory Strikes Back,"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21, (January 1999), pp.34-35.

向也逐漸成為戰略文化研究與理解中共戰略思維與作為的顯學。2002年7月「美中安全審查委員會」在向美國國會提出的報告中即指稱：「中國大陸在戰略思維與軍事運籌方面，與美國有顯著不同，由此凸顯出更審慎研究此種差異之必要性。」³報告同時警告道：「由於兩國在思考與運籌上的重大差異，因此發生誤判形勢、錯誤傳達與誤解意圖的可能性甚高，美國決策官員與國會必須更加注意此種情況。」³約在同時，美國國防部向美國國會提出的《中共軍力報告》也提及，中國大陸與美國的戰略思維明顯不同，因此必須謹慎理解與因應。有趣的是，到了2014年，美國仍然對中國大陸戰略文化與意向深感興趣，⁴特別是在中共軍事意圖與能力透明度仍然不足的情況下。

究其實，以圍棋作為分析與研究中共戰略作為的取向，武溫並非第一人。在他之前David Lai、季辛吉與臺灣學者王志鵬都曾經從圍棋的角度，探討中共戰略思維、作為或演繹至東海、南海的紛爭案例上。上述學者專家的見解，提供研究中共戰略文化的新視野，但也引起相當程度的爭議，武溫自然也

不例外。本文主要目的即在於從探討戰略文化與中國戰略文化研究為起點，進一步分析以圍棋思維作為分析途徑對研究中共戰略文化的貢獻與影響，最後則討論此一取向所遭遇的限制因素。

戰略研究的文化途徑與中國研究

一般而言，戰略文化指的是一個國家的傳統、價值、態度、行為方式、習慣、象徵、適應環境變化和解決危機或使用武力的特殊方式。⁵因為戰略家在特定的歷史文化環境和教養中進行認識和實踐創造活動，因此可以說，戰略文化是制定現實戰略的潛意識和歷史文化情結。⁶

一、戰略文化研究途徑

不同的戰略文化決定了不同國家對於戰爭與和平、衝突與合作等國際關係主題的認識，塑造不同國家的身分認同和戰略偏好，進而決定國家之間不同的戰略選擇，也就是國家的戰略行為。⁷對此，詹姆斯(Ferguson R. James)認為，戰略文化會對於決策者的決策模式、戰略偏好及使用軍事力量解決爭議的傾向產生作用。⁸美國戰略學者葛瑞(Colin S.

3 China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Report to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July 2002.

4 Anthony H. Cordesman, 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Force Development: Chinese and outside Perspective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4) p.35.

5 Ken Booth and Russel Trood, eds., Strategic Cultur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oundsmills: MacMillan Press, 1999), pp.363-371.

6 李際均，論戰略(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頁19。

7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36.

8 Ferguson R. James, "Inclusive Strategies for Restraining Aggression- Lessons from Classical Chinese Culture," Asian Philosophy, Vol. 8, Issue 1 (March 1998), p. 31.

Gray)則強調，不研究決策的文化情境，則對戰略行為的解釋必是狹隘和無意義的。⁹

戰略文化研究將戰略文化基本的認定為價值觀、行為模式或符號系統。¹⁰戰略文化理論假設，在同樣社會情形中，被不同戰略文化的決策者做出不同的戰略選擇，戰略文化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證明戰略文化，做為國家行為的一種思想來源，有助於揭示國際關係和戰略研究中，文化觀念與行為之間更明確的關聯，也就是不同戰略文化決定不同國家對於戰爭與和平、衝突與合作的認知，塑造不同國家的身分認同與戰略偏好，進而決定不同國家之間，不同的戰略選擇與戰略行為。¹¹布斯(Ken Booth)即認為戰略文化有助於國際關係學者在亞太區域研究、戰略研究、安全研究、衝突管理與國際關係理論五大領域的研究。¹²

一般而言，西方戰略文化研究的發展可

概分為三個主要時期：¹³第一代僅將文化因素看成是戰略文化取向的一個面向，未將文化視為戰略取向的主導因素；第二代主要從文化霸權的角度進行研究，¹⁴也有學者從武器文化的角度進行探討；¹⁵第三代主要偏重組織文化對戰爭的影響。基本上，西方戰略文化研究學者認為，戰略決策的產生不只是以客觀物質環境為依歸的理性取向，而是決策者受到文化傳統、歷史等因素的侷限下之行為體現。¹⁶冷戰結束後，隨著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逐漸興起，將戰略文化研究注入新的啟發與理論補充。¹⁷

不過，正如普爾(Stuart Poore)所言，戰略文化的文化變數很難被定義和具有操作性，到底應如何或怎麼知道戰略文化被內化到戰略決策者，從而得知戰略文化對國家的戰略行為產生影響，是一大困難。¹⁸截至目前為止，學者對戰略文化概念的界定，存在分歧

9 Stuart Poore, "What is the Context? A Reply to Gray-Johnston Debate on Strategic Cult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9, No.2, pp.279-284.

10 戰略文化的宏觀研究側重於對地理、民族文化特點和歷史的分析，綜觀研究側重於分析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微觀研究重點剖析軍事組織和軍政關係。參見Carl G. Jacobsen, ed.,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London:St. Martin's Press, 1990), pp.35-49.

11 秦亞青，文化與國際社會：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頁142。

12 Ken Booth and Russel Trood, eds., *Strategic Cultur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oundsmills: MacMillan Press, 1999), pp.389.

13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4-22.

14 Bradley Klein, "Hegemony and Strategic Culture: Bradley S. Klein American Power Projection and Alliance Defence,"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4, (Spring 1988), pp.133-148.

15 Robin Luckham, "Armament Culture," *Alternatives* 10, (Spring 1984), pp.1-2.

16 方長平，「西方戰略文化研究：從文化主義到建構主義」，國際論壇，第6期，2002年，頁6。

17 溫特(Alexander Wendt)，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

18 Stuart Poore, "What is the Context? A Reply to the Gray-Johnston Debate on Strategic Cult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il 2003), pp.279-284.

的意見；再者，對於文化在決策領域的影響程度，¹⁹學者之間爭論不休；例如科林(Coline S. Gray)就認為江憶恩誇大戰略文化對戰略行為的解釋，並認為戰略文化無法決定戰略行為，應該只能作為瞭解一國戰略行為的背景參考；²⁰對於一個國家是由一個或多個文化所導引，學者間也有不同見解；例如格雷就強調，某一特定的共同體可能具有不止一種戰略文化，就像針對特定的任務或地理環境會有多種軍事文化一樣。此外，戰略文化的主體是國家、次國家，還是超國家，看法也始終莫衷一是，且存在許多模糊之處與爭論。

二、中國戰略文化研究

學界有關戰略文化的研究，逐漸延伸至對中國方面的研究。哈佛大學的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教授指出，近年來戰略文化的研究蔚為風潮，而其中研究中國的戰略文化也顯得特別地興盛。²¹不過，對於中國戰略究竟是否與西方不同存在爭論。中國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宮玉振認為，中國戰略

文化凸顯的是天下情懷與道德意義，而西方戰略文化則凸顯的是圍繞多元政治實體的競爭(國家衝突)而展開的，突出的是衝突的意識和暴力的價值。²²美國學界也普遍認為中國有獨特的戰略文化，那是種偏好低度暴力的反黷武主義，與西方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強調暴力、集中兵力進行決戰的觀念大不相同。²³例如，邁克爾·史溫(Michael Swaine)、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Tellis)指出，中國人的安全戰略觀念，向來堅持以施展文化、政治影響力為主導，以有限的軍事手段為輔助工具，爭取周邊民族的自願歸附為目標，與這種安全觀相聯繫的戰爭觀，也必然是慎戰，而非黷武的。²⁴然而，江憶恩對中國明朝的研究顯示，當環境與情況有利於中國時，中國毫無例外地往往採取武力解決的方案。因此，他反對中國是愛好和平國家的主張或觀點。江憶恩認為，中國戰略文化與西方並無太大不同，也是屬於強度政治的典範模式。²⁵

19 Morgan, *Compellence and the Strategic Culture of Imperial Japan*, pp.28-31.

20 Coline S. Gray, "Strategic Culture as Context: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ory Strikes Back,"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21, (January 1999), pp.49-69.

21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41-42.

22 宮玉振，*中國戰略文化解析*(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32-33。

23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p. 25~26;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ist Chin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it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18

24 邁克爾·史溫、阿什利·特利斯著，洪允息、蔡焰譯，*中國大戰略*(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頁16、61。

25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秦亞青主編，*文化與國際社會：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北京：北京知識出版社，2006年)，頁157。

以及中國戰略性質是屬於進攻型還是防禦型，也存在分歧的見解。馮天瑜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以農耕經濟為主體的民族，農耕經濟是一種和平自守的經濟，由此衍生出的民族心理必然是防守型的，長城就是最能體現中華民族注重防禦思想的精神標誌。²⁶中共軍事科學院李際均認為，中國主張和平、傳統道德的原則，有著注重防禦的戰略傳統。²⁷李少軍指出「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是不乏現實主義考慮的，但總體上看，和平主義、理想主義的成分影響更大」。²⁸秦亞青在《國家身分、戰略文化和安全利益》一文中提出，對中國戰略文化的基本假設，即「中國的主導戰略文化經歷著再建構的過程，從一種較多屬於衝突型的戰略文化，朝向較多屬於合作型的戰略文化的方向轉化」。²⁹張鐵軍甚至認為，歷朝皇帝與文武百官無不深受儒家文化教化與洗禮，因此，傳統中國戰略文化應該更偏向於文化道德主義。³⁰

西方學者方面，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黎安

友(Andrew J. Nathan)從中國地理易受攻擊、疆域銜接各國陸境，衍生出長城、空城計兩種謀略文化，進而得出中國是屬於防禦性質的戰略文化。³¹不過，攻勢現實主義學者米爾斯海默認為，中國的儒家思想就好比美國的自由主義，只能算是煙霧彈，領導人既可以如理想主義者高談闊論，又可以如現實主義者一樣行動。換言之，儒家思想或許是影響包括中共政權在內的中國歷代政權，戰略思維也是其中一個因素，但事實上，卻有其他更為密切的因素影響戰略決策的制訂，古代君王無暇顧及儒家的價值文化，而需倚重其更客觀，或更有效能的戰略宏觀，藉以取代道德訴求之文化意涵。³²更有甚者，儘管飽受大陸學者批評，³³但江憶恩認為中國戰略文化的現實政治屬性與傳統西方無異，且傳統中國與毛澤東時期，在戰略文化所預測行為是相類似的。³⁴

三、中國戰略文化特色

客觀而言，中國大戰略的歷史文化起

26 馮天瑜，中華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120。

27 李際均，軍事戰略思維(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頁237-238；李際均，論戰略，第20-22頁。

28 李少軍主編，國際戰略報告：理論體系、現實挑戰與中國的選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頁519-520。

29 秦亞青，「國家身分、戰略文化和利益安全—關於中國與國際社會關係的三個假設」，世界經濟與政治，第1期，2003年1月，頁18。

30 Zhang Tiejun, "Chinese Strategy Culture: Traditional and Present Fea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 No. 21, 2002, pp.73-74.

31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陸伯彬(Robert S. Ross), 何大明譯，《長城與空城計—中國尋求安全的戰略》(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頁79-80。

32 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大國政治的悲劇(Tragedy Great Power Politics)，王義槐等／譯(臺北：麥田出版社，2014年)，頁470。

33 秦亞青主編，文化與國際社會：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研究，頁163-164。

34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55.

源很早，從先秦到明代，諸如《周易》、《尚書》、《左傳》、《孫子兵法》、《三略》、《六韜》、《鬼谷子》等典籍，產生諸如兵家、法家、縱橫家等不同的流派。在戰略上，歸納而言，大陸承襲中國傳統文化之處，儘管沒有證據加以支撐，但仍在下列方面顯現出來：

(一)對兵法的寬廣解釋

在西方的傳統上，在戰略思維方面戰略十分強調武力的使用；兵法絕大部分局限於戰場，而作戰的方式更完全是以暴制暴。³⁵但在中國，誠如我國前國防部長林中斌教授所指出，中國戰略是超越軍事範疇而涵蓋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等項目的。孫子在其兵法中視「戰爭的政治、外交與後勤準備」、「作戰」以及「戰後處理」為兵法不可分割的環節。在此一廣泛架構下，兵法本質上是外交的程序，戰爭是外交的繼續。因此在《孫子兵法》中，孫子視整個戰爭不論是由準備、執行到結束，皆為首要而至高的智慧挑戰。用兵本身反而是次要的。由孫子的觀點，勝者用兵系鞏固其必然之勝利，而敗者用兵則僅是孤注一擲或求生之最後嘗試（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後者是失敗的戰爭策略。

毛澤東以降的中南海領導人，無一不重視超越軍事範疇的安全思考。毛指出「自

覺地動性是人類的特點，人類在戰爭中強烈表現其特點。戰爭的勝負，固然取決於雙方軍事、政治、經濟、地理、戰爭性質、國際援助諸條件，然而不僅決定於關鍵因素，尚需加上主觀自覺地動性。參與戰爭的人，不是指個體的人，而是指整個社會、整個軍隊的人的總和」。³⁶美國國防部在2002年7月所公布《中國軍力評估報告》中呼籲，美國應注意其對中國戰略思維方面瞭解的種種不足。該報告特別提出所謂「勢」(shi)的概念，稱中國正運用此戰略思維「調整戰力配置」(strategic configuration of power)、加強國家保衛獨立的能力，並發展其綜合國力。五角大廈的報告強調：「西方世界並無與『勢』相同的概念。據中國語言學家的解釋，『勢』是『諸力之一致方向』、『事物之共同趨向』或『技巧安排所生之潛力』，惟修養深厚之戰略家方能通過造『勢』而達成以弱勝強之目的。同樣地，對方也惟有開展精密評估，方能識破造『勢』的潛在性。」³⁷

(二)重視謀略與戰略

整體而言，西方文化建立在理性主義、上帝意識和羅馬法三個傳統之上，理性主義二元論是西方文明的核心。³⁸對中西戰略特性學者們存在一個共識，那就是西方的戰略著重於對陣式的二元對抗，因此強調將帥士

35 Roger D. McGrath, "The Western Way of War: From Plato to NATO", *Chronicles: A Magazine of American Culture*, February 2001, pp. 13-15.

36 岳嵐，軍事辯證法(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96。

37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uly 2002, p. 6. Pentagon's 2003 report reiterates this observation.

卒的勇氣。中國則傳統以來就強調「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謀略與智慧。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指出，「中國的戰爭之道偏好以非暴力達到目標，戰爭手段只是征服敵人的方法選項，並強調以較小代價消磨外來攻擊或使內部叛亂，而非將有生力量殲滅。」³⁹中共解放軍李際均中將(退役)認為：「古代中國的軍事科學崇尚足智多謀、謀略及啟戰與用兵的審慎。…，在擬定策略時所遵循的原則是『制定軍略、首重謀略』。其目標為不戰而求其『全』勝。為達此一目的，他們必須全面分析戰略情勢，審慎架構戰略政策、訂定合宜之戰略目標、正確選擇戰略路線、針對性規劃戰略步驟以及正確運用戰略手段。」⁴⁰

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將馬列主義軍事思想中國化，除了中國戰爭實踐的經驗外，也受其中國文化背景的影響，⁴¹毛澤東的全局謀略觀至今影響中共軍文決策者。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帶領大陸走向「改革開放」並要求「軍隊要服從大局」的大局思想；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著重於「大國外交」，並提倡「新安全觀」；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提出「和平發展」主張，建構內部和諧、兩岸和解與世界和平的戰略內涵；第五代的習近平

則透過「一帶一路」，採東躍西進方式，以海權來保障陸權，以陸權支持海權的方式，謀求國家繁榮與安全。上述領導人的主張，在在顯示出中南海領導人至今非常重視謀略與戰略的擘劃，鞏固內部安全、團結友善力量，並以切香腸的方式逐步縮小孤立並打擊敵人。

(三)重視辨證法的運用

前面提及，西方國家無論大小強弱，在作戰觀念上強調正面對決，因此作戰幾乎皆以對陣方式進行。相對而言，中國傳統極為重視辨證性力量交會所產生的策略。對此，大陸戰略學者吳春秋指出：「中國傳統的中庸思想與西方觀念，尤其是克勞塞維茨的『絕對』戰略觀念截然相反、相映成趣。緣起於中國的傳統戰略文化，…，富國強兵、兵農結合、文武並重、不戰而勝、剛柔並濟、以弱勝強是保證大戰略目標實現的手段。」⁴²美國陸軍軍事學院施道安(Andrew Scobell)則認為「中國有雙重的戰略文化：一是孔孟之道，反對衝突、重視防禦；二是現實主義政治，傾向於以軍事方式解決問題，具有進攻精神。這兩種思想都在發揮作用，都在產生影響，並辨證地結合起來」。⁴³

綜觀《孫子兵法》，其中充滿各種對戰

38 李翔海、鄧克武，論中西哲學精神(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12。

39 John K. Fairbank, ed,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25-26。

40 Li Jijun, *Traditional Military Thinking and the Defensive Strategy of China*, Letort Paper No. 1,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1997.

41 李鵬程，毛澤東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82。

42 吳春秋，論大戰略和世界戰爭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頁137-139。

43 Andrew Scobell, *China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6.

略概念辨證本質的分析，諸如強弱、眾寡、攻防、奇正、曲直、分合、勞逸、進退、遠近等，以及上述戰略狀況之相關性與相互的轉換。在充分理解彼此關係強弱後，才能探究因敵制勝之道；換句話說，強有強的打法、弱有弱的打法，因此可以以強勝弱，但也能夠以弱擊強。一般而言，強者的作戰模式通常是朝廷軍隊所採用的模式；至於弱勢的作戰方針，如果不是採取聯盟方式為之，通常就是採用游擊戰術，因而形成中國戰略傳統中，弱能勝強與避實擊虛的原則。⁴⁴

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戰略與游擊戰法即根源於中國古代農民起義的經驗與游擊戰的傳統。面對國民黨的優勢武力，在缺乏盟友的情況下，共軍採用「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辨證性力量轉換策略存活下來，⁴⁵並在抗日戰爭期間擴大成「戰略退後(敵強我弱時)、戰略僵持(敵我力兩均勢時)與戰略進攻(我強敵弱時)」三個階段戰略構想。此外，由於武器處於劣勢，毛澤東則以人的優勢去彌補甚至超越。⁴⁶由此可見，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戰略，重視敵我關係的辨證性。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此一辨證法與馬克思的亦有異曲同工之妙。⁴⁷

整體而言，毛澤東的人民戰略立足於敵強我弱的情況，因此採取誘敵深入的戰略，鄧小平的「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戰略，則

力求在敵我各有優勢的情況下，通過「積極防禦」手段進行戰略僵持於國境線上；江澤民到習近平則逐步走向打贏高技術與信息化局部戰爭的戰略進攻性思維。

(四)強調出其不意的奇襲

西方戰略重視正面對決，因此對於「偷偷摸摸」地偷襲敵人的作戰方式深感不屑。曾經有相當長一段時間，英國總認為水下攻擊敵方非光明磊落的作戰之舉，因此潛艇官兵的地位與士氣始終低落。不過，奇襲並非作戰應有典範的觀念，由於潛艇與特種作戰的興起與戰爭勝利的本益比考量之下，西方國家逐漸擺脫過去輕蔑奇襲的作法，也開始相當重視奇襲所帶來的效益。特別是在當代歷史中，攻擊一方的勝率超過六成，在戰術上採取奇襲的國家往往能占上風，航空母艦發明後，這種趨勢越加明顯」，⁴⁸

至於中國則自始至終皆在《孫子兵法》攻其不備、出其不意的鼓勵下進行奇襲作戰。孫子主張詭道，強調「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等觀念。此一詭道觀念當然也沿襲到中共建立政權之後，例如在韓戰期間，即有「美國人擁有天空、中國人擁有月亮」的說法，顯示當時人

44 田震亞，中國近代軍事思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8月)頁30。

45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頁198。

46 岳嵐，軍事辨證法，頁97。

47 列寧，列寧軍事文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頁454。

48 李際均，「論戰略文化」，中國軍事科學，第1卷第1期，1997年7月，頁174。

民志願軍夜間突襲作戰對美軍所造成的損失與心理壓力。韓戰之後，無論是國共在大陸島嶼爭奪戰期間，還是兩次金門危機，解放軍均採奇襲方式為之。之後的中印邊界戰爭、中蘇珍寶島、中越西沙海戰、懲越戰爭以及與菲律賓之間的美濟礁衝突，在在顯示中共對於奇襲作戰的重視與運用之嫻熟。

從研究的角度以觀，儘管戰略文化對一國的戰略思維與作為具有某種程度的影響力，然由於在定義上至今仍存在不同且往往互相衝突的界定，因此無法對戰略文化在戰略思維與作為所造成的影響，能建構起客觀觀察的指標。所以我們都知道也相信戰略文化影響著一個國家的戰略作為，但卻往往陷入既不能證明為真，也不能證明為假的邏輯困境之中。因此，筆者建議學者能針對此一戰略文化研究困境，進行延伸性研究。

圍棋角度探討中共戰略的主張

誠如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的《大棋盤：美國的主宰地位與其地緣戰略的必要條件》(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中，顯示出美國政、軍領袖對於西洋棋等遊戲在

相當大的程度上反映了西式文化，同時也對其文化、戰略思維與美國戰爭方式造成影響。⁴⁹同樣的，在戰略文化研究方面，一些學者也開始流行以圍棋來分析大陸的戰略作為。

一、圍棋的造勢

美國空軍戰爭學院教授來永慶(David Lai)於2004年5月的美國軍事研究期刊發表「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以中國圍棋剖析『勢』的戰略」研究，從此帶動以圍棋來探討中共戰略文化的風潮。這篇文章刊出後，當年7月即為我國國防部所出版的《國防譯粹》第41期第3卷所翻譯轉載；⁵⁰接著2007年大陸軍事期刊《空天力量》第1卷第3期也翻譯轉載。⁵¹此外，來教授的觀點也被季辛吉(後面將會分析)、謝之鵬等軍事學者所引用，⁵²足見此文在學術界與兩岸軍方所受到的重視。

來永慶教授指出，圍棋是一種生動反映中國哲學、文化、戰略思維、軍事戰役、戰術與外交運作的藝術，特別是圍棋與《孫子兵法》所述戰略概念間明顯的關連。誠如孫子所言，「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美國領袖只要對圍棋稍有認識，將可在瞭解中國戰

49 Zbigniew Brzezinski,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1st Edition edition, 1998).

50 David Lai著，黃文啟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以中國圍棋剖析『勢』的戰略」，國防譯粹，第31卷第7期，2004年7月，頁71。

51 參見來永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由圍棋角度剖析中國『勢』的概念」，空天力量，第1卷第3期，2007年冬季號，頁47-61。

52 謝之鵬，「從孫子慎戰思想論我國家戰略應有體認與作為」，國防雜誌，第29卷第1期，2014年1月，頁25；謝之鵬，「論孫子慎戰與全勝思想之省思」，陸軍學術雙月刊，2011年6月號，頁46。

爭與外交方式方面，有長足的進展。值得注意的是，根據作者的分析，中國循著古代戰略思維的路線，已在追求國家目標方面獲得重大進展，在建設中國大陸、營造有利的周邊局勢和處理臺灣問題上的作為尤其顯著。基於統一臺灣是北京政府的歷史使命，大陸希望完好無損地收回臺灣。

為此，中南海領導人正遵循著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原則達到這一目標。在收復臺灣的過程中，「造勢」是這一使命的關鍵戰略，其中包括主要三個方面：第一、是通過經濟與臺灣整合；其次，是建立有效的軍事威懾以對付臺獨；第三則與美國建立合作關係，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以維持臺灣海峽的現狀。畢竟，在各方還不能坐下來談判之前，這一情勢有利於保持臺海局勢的穩定。根據作者的評估，中國大陸在這三個方面的造勢都是成功的。以上這些思維與國策表現出中國方面對「勢」的深刻理解、掌握和發揮。而所有這些都可在圍棋對弈中得到

啟示。⁵³

二、圍棋的辨證

來永慶以圍棋為切入點說明與分析北京策略的觀點獲得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的(Henry Kissinger)認同，因此在季氏新著《論中國》(On China)中，仿照來永慶思維，以圍棋詮釋毛、鄧處理韓戰、臺海、越戰、東南亞衝突、對蘇往來以及與美國關係正常化。⁵⁴《論中國》一書受到國際與兩岸的重視，例如美國《紐約時報》、北京《北京日報》、⁵⁵臺灣《旺報》、⁵⁶《新紀元週刊》⁵⁷等兩岸與國際刊物均以相當篇幅予以推介。此外，除我國前大使陸以正也曾特地為文予以評介外，⁵⁸中國大陸前任外交官陳有為也曾在華府以「從基辛格(季辛吉的大陸譯名)新著《論中國》看大國外交與世界格局」為題發表演說。⁵⁹《自由時報》則延伸季氏論點於中共宣布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分析上。⁶⁰

《論中國》的主要內容是講述1949年之後中美兩國領導人之間的相互交往，諸如新

53 有關來永慶教授的觀點，參見David Lai, Learning from the Stones: A Go Approach to Mastering China's Strategic Concept, Shi (Carlisle, PA: SSI, May 2004).

54 Keith Johnson, "What Kind of Game Is China Playing?",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1, 2011, website: http://www.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259304576374013537436924?mod=googlenews_wsj&mg=reno64-wsj&url=http%3A%2F%2Fonline.wsj.com%2Farticle%2FSB10001424052702304259304576374013537436924.html%3Fmod%3Dgooglenews_wsj

55 李可為，「解密：基辛格的中國觀」，北京日報，2012年10月30日，版8。

56 「社評—季辛吉論中國 造夢或別有用心？」，旺報，2011年6月6日，版2。

57 陳邁克，「抗衡中共 人權利劍是寶器」，新紀元週刊，第241期，2011年9月15日，頁72-75。

58 陸以正，「季辛吉論歐巴馬」，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安(評) 098-152 號，2009年7月27日，網址：<http://www.npf.org.tw/printfriendly/6189>

59 金大俠，「華府書友會十一月份演講 陳有為主講『從基辛格新著《論中國》看大國外交與世界格局』」，UDN網路城邦，2011年11月13日，網址：<http://blog.udn.com/chin8673/5834878>

60 曹郁芬，「華府觀察：中國圍棋戰略 東海制空權博弈」，自由時報，2013年12月2日，版3。

中國的一邊倒外交政策、抗美援朝、中美建交、臺海危機等重大外交事件。季辛吉從圍棋文化、《孫子兵法》、《三國演義》等探討中國獨特的戰略思維模式，尤其是中國注重相對優勢、注重謀略、著眼長遠的戰略。季辛吉認為，解讀當代中國的崛起需要觀照歷史的特殊性。歷史的經驗是，中國強盛時會鎮撫四鄰，衰微時則以拖待變，爭取時間以憑藉歷史文化的沉澱而恢復自己的大國地位。過去中國的實力比較弱，因而不得不在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三角關係中斡旋。改革開放後鄧小平深知中國國情，反覆強調要冷靜觀察、沉著應付、韜光養晦、發展自己。中國大陸的改革不是追求烏托邦式的願景，而是建設包含有儒家內涵的全面小康社會。當今中國大陸日漸強盛，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最多的外匯儲備。北京已有足夠自信，可以按照實際力量而非長遠潛力、最終戰略角色來實施外交政策。然而，大陸所主張的目標是防禦性的，是按照自己的步驟來解決國內問題，不試圖改變他國的信仰，不對海外推行本國的現行體制。

此外，季辛吉用圍棋與國際象棋比較中國與西方戰略的不同。國際象棋是重心論和決勝論，在棋盤中展開廝殺以決出生死。圍棋則是戰略包圍的藝術，在此消彼長中爭取相對優勢。中國式治國之道是務實和耐心的戰略頭腦，他將西方的戰略比做下國際象棋，關注的是資源投入、對比、畢其功於一役；而中國戰略則像下圍棋，強調不爭一城

一地之得失，要慢慢積蓄力量、以勢取勝，最終建立對對手的優勢。⁶¹

三、圍棋的雙活

2013年6月4日，大陸廣東海洋大學「海洋政治與戰略」研究室主任張建剛在《環球時報》上發表「美國已認識到唯中國夠格在世界大棋盤與美對弈」一文。文章指出，西方人喜歡下國際象棋，中國人喜歡下圍棋，這兩項都代表人類高級智慧的遊戲恰恰表現了東西方不同戰略觀、價值觀。在和平與發展成為當前世界潮流時，在實現「中國夢」進程中，北京有必要讓美國及西方人認識中國的戰略觀與價值觀。對於中國大陸的策略，張建剛認為，中南海領導者下的是「合作共贏的『雙活棋』，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棋』」。因為，憑著五千年的文化底蘊和戰略功底，中國大陸各代領導人把握既不能過分用強又要主動發力的分寸，帶領中國人民經過「獨立自主」，「韜光養晦」到「有所作為」的幾招，已在世界的棋盤上出現不錯的中盤形勢。

作者認為，當前世界盤棋上在中國周圍有三個「劫爭」棋：一是有關中美的臺灣問題，二是有關中日美的釣魚臺問題，三是有關中俄美日韓的朝鮮問題。其中釣魚臺是二戰後沒有收完的一個「大官子」，臺灣問題是中國白棋的勢力範圍內被黑棋利用的價值問題，朝鮮則是冷戰的延續問題。對此，北京要充分利用當前有利時機，繼續經營與亞歐大陸、中東、非洲和南美洲之間的關係。

61 本節有關季辛吉的論點，參見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NY: The Penguin Press, 2011).

當華府有求於北京時，臺海乃至西太平洋才能由中國的厚勢轉變為中國的實地。因此，張建剛強調，中美在亞太乃至整個太平洋下的不是「死活棋」，而是合作共贏的「雙活棋」。⁶²不過，這篇專論並沒有獲得太多的重視，被轉貼到《環球軍事評論》網站後回應者也僅有一人，而且不甚認同作者觀點。⁶³

中國大陸在2013年11月正式公布東海防空識別區之後，美國資深外交官包道格在接受《Bloomberg》訪問時指出，北京政府採取圍棋策略，在不引起武力回應的情況下，逐步擴大對該地區的影響力；上述論點，呼應了圍棋「雙活」策略的分析取向。同時，他預測下個目標將會是南海。此篇文章截至2015年1月10日為止，總計有611篇回應。⁶⁴

臺灣軍事專家王志鵬在《東方報業集團網站》的「政軍潛望鏡」專欄中撰文發表「美中亞太的戰略雙活」；文中王志鵬指出：「圍棋與西洋棋是東、西方自古以來二大最流行的遊戲，但下法卻大不相同，難度也各異。」西洋棋與圍棋的思考與著重方式

截然不同。就圍棋部分，王進一步介紹，圍棋雙方攻守分為「布局、中盤、收官」三個階段，講究的是「地(位置)」、「勢」與「氣」，其變化約 2.08×10^{170} 種。雙方都可以採取「先制」、「擱置」或是「爭奪」的方式，至於是朝「大勝大敗」，「小勝小敗」，還是「循環雙和」發展，端視雙方對此通盤大局的態勢所發揮的智慧。

從圍棋思維與態勢來觀察，王志鵬認為，對大陸而言臺灣位居整盤棋重要關鍵的「天元」位置，在美、中雙方競爭和合作之下，最後無論是主權或戰略問題都無從迴避。東海與南海即該盤棋所形成的「戰略雙活」。⁶⁵不過，這樣的態勢在美、中雙方持續戰略布局到了最後，仍將將攤牌。⁶⁶王志鵬此文經兩岸和平研究中心執行長張蜀誠轉發表至臉書「兩岸和平研究中心」社團之後，引發兩岸三地包括北京大學、高雄中山大學、文化大學、淡江大學等學者之間的激辯。⁶⁷

四、圍棋的包圍

2014年南海情勢升溫，中國大陸在南海

62 張建剛，「美國已認識到唯中國夠格在世界大棋盤與美對弈」，環球時報，2013年6月4日，版6。

63 有關回應內容，請參閱http://comment.huanqiu.com/?a=do_action&action=comment&uid=1301947

64 “China Adopts Board-Game Strategy to Blunt U.S. Pivot to Asia”, Bloomberg News, Dec 10, 2013, website: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12-09/china-adopts-board-game-strategy-to-blunt-u-s-rebalance-in-asia.html>

65 「雙活」是圍棋的專用術語，係指雙方黑白棋子互相形成包圍，但是每一方都無法將對方的棋子提掉的棋形；不過，這樣的態勢在整個棋局下到最後決勝階段，雙方彼此就必須針鋒相對因應，而對應方式雙方都必須視全盤態勢而有所取捨。

66 本節有關王志鵬圍棋雙活的論述，參見「政軍潛望鏡：美中亞太的戰略雙活」，東網，2013年12月19日，網址：http://tw.on.cc/tw/bkn/cnt/commentary/20131219/bkntw-20131219004606971-1219_04411_001.html

67 針對王志鵬雙活圍棋的正反辯論，請參閱兩岸和平研究中心臉書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17446431620529/search/?query=美中亞太的戰略雙活>

擴建人工島礁與軍事設施引發區域譁然。其中最受矚目的舉措，就是在南沙的永暑礁填海造地。中國大陸正在位於南沙群島的永暑礁填海造地，看似有個3,000公尺長的飛機跑道，與大得足以停靠油輪和大型軍艦的港口。2014年12月8日，亞太安全研究中心副教授亞歷山大·武溫(Alexander Vulving)在美國「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雜誌網站發表的文章指出，西洋棋講究將死，而圍棋從名字就可見，是一種講究包圍的遊戲。圍棋中沒有王、后或兵，只有相同的棋子。棋子的權力取決於其在大布局中的位置。如果說西洋棋是兩軍對壘，圍棋則是布局之爭。若南海被視為西洋棋棋盤，那中國的種種舉動基本微不足道。前進的多是卒子，更強棋子尚未啟動。北京介入南海爭端的主要力量鮮有軍事的，絕大多數是漁船和輕武裝公務船。

從西洋棋的角度來看這場博弈，一名資深美國外交官認為，「大國不會為了幾塊岩礁而大動干戈。」但在圍棋手看來，中國在南海所做的，正是熟稔下棋的典型例子。最終目標是取得對整個地區的掌控。實現該目標有賴於漸進式擴張，而非大規模戰役。這種擴張是個持久過程，橫跨長達數十年。與該戰略相應，「切香腸」和「小棒外交」均

屬優選戰術。其潛在邏輯是，通過不動聲色地操縱地區戰略格局，逐漸使形勢向有利於中國大陸支配的方向轉變。該戰略有賴於一些必要規則：第一是盡可能避免公開武裝衝突；第二是控制最重要的海上戰略位置；第三是將這些位置發展成強固的控制據點、後勤保障中心和兵力投射基地。

從過往行為來看，作者認為北京一直在巧妙、俐落地遵循這幾條原則。近60年北京曾經多次奪島，但只有2次發生武裝衝突，幾乎沒帶來什麼外交後果。如果近中期，北京還在渚碧礁、美濟礁和黃岩島上建飛機跑道和深水港口，那也不會讓人意外。擁有了更大和戰略位置重要的島嶼後，中國大陸會比任何其他大國更有潛力獲得南海的制空、制海權。作者預測，今後20年南海若密布中國大陸的強大基地，也並非不可想像。作者強調，中國大陸在南海的大戰略是一記妙招，它利用了美國依賴大規模戰役戰略的軟肋。但這種漸進式擴張戰略遠非無懈可擊。若美國、越南和其他地區國家像中國大陸一樣「善下圍棋」，北京就會遇阻。⁶⁸文章發表後，引起《旺報》、⁶⁹《中國時報》、⁷⁰《中國評論新聞網》、⁷¹日本《外交家》(The Diplomat)網站的轉載與正反面的評論。

68 有關武溫的觀點，參見Alexander Vulving, "China's Grand-Strategy Challenge: Creating Its Own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National Interest, Dec. 8, 2014, website: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s-grand-strategy-challenge-creating-its-own-islands-the-11807>

69 陳昶睿，「南海下圍棋 陸包抄美亞太部署」，旺報，2014年12月10日，版10。

70 徐秀娥，「美國人看懂了 中國大陸在南海下圍棋」，中國時報，2014年12月9日，版12。

71 「美稱中國一計妙招讓20年後強大基地密布南海」，中國評論新聞網，2014年12月10日，網址：<http://hk.cmtt.com/doc/1035/1/9/7/103519759.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3519759>

圍棋角度探討中共戰略問題與思考

正如戰略文化研究所遭遇的問題一般，以圍棋作為研究中國大陸戰略的途徑存在無法證明為真，也難以證明為假的邏輯困境。再者，圍棋是否足以代表中國戰略文化，不僅存在爭議也頗值得商榷。畢竟，除了圍棋以外，與西洋棋類似的象棋似乎在華人文化圈中更為普遍，若用象棋來連結孫子兵法或分析中國傳統戰略，同樣也在詮釋上行得通，這導致不同路徑的仁智之見且各有各的道理。在《京華時報》2014年5月的一篇採訪報導指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大學聽取包括國際象棋冠軍侯逸凡在內的學生代表匯報。總書記向這位棋士提出「一個關於國際象棋的非常專業的問題」，習開玩笑地表示要讓侯逸凡「回頭給外交部的官員們好好上上課，幫助他們從棋局中學學博弈的道理和方法。」⁷²顯然，習近平對象棋在國際局勢的應用性似乎高於圍棋。

第三，儘管身為大陸著名圍棋棋士聶衛平好朋友的習近平同樣也懂得下圍棋，⁷³但這是否即表示習近平以圍棋進行思考並採取行動？目前為止，仍缺乏實證性的證據足以判斷。但若這樣的見解成立，那麼喜歡橋牌，

還曾長期擔任橋牌會會長的鄧小平應如何解釋？有趣的是，《美國之音》的一則評論指出：「現在的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就像一盤圍棋，只要香港和臺灣堅持民主道路的追求，就等於是在這盤圍棋上占領了兩個角。只要這兩個角的棋活了，按照圍棋的規則就永遠活定了，而且有機會奪取全盤棋的勝利。」⁷⁴顯然，以圍棋看待地緣政治發展及建構策略，並非中國專屬智能。

2014年12月20日，本文初稿針對圍棋研究途徑問題提出批判之際，讀到專研中共海權的美國海軍學院教授荷姆斯(James Holmes)在日本《外交家》(The Diplomat)所發表《東南亞海域：一盤圍棋？》批判性文章，與本文前段見解頗有呼應。該文作者指出，對他來說，如果想武溫這樣堅持認為北京在南中國海的舉動是微不足道的，那麼這種理解就是錯誤的。這種思維方式受到國際象棋的影響，即兵卒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捨棄的，戰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線性特徵。然而通過部署兵卒，即海警船、漁船，以及島礁，中國大陸正在包圍並影響——如果不是控制著——它所聲稱擁有合法主權的大片海域和天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兵卒」在更強大的力量支持下會帶來控制權。荷姆斯認為，也許並非巧合，海軍外交家不下國際象棋，在

72 轉引自「中國已進入需要形成大戰略的年代」，中國評論新聞網，2014年5月9日，網址：<http://hk.crntt.com/doc/1031/7/5/0/103175023.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3175023>

73 高曉，習近平：中國新領導人(臺北：高寶書版，2011年11月)頁131-160。

74 轉引自「環球網：香港不能成西方反華勢力的橋頭堡」，中國評論新聞網，2014年10月3日，網址：<http://hk.crntt.com/doc/1034/1/3/1/103413184.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3413184&mdate=1003160048>

這方面毫無天賦也不感興趣。此外，人們也懷疑，圍棋在中國人中是否如此無孔不入，以至於壓倒了普通的成本收益邏輯、儒家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等。總之，作者強調，不要過分渲染社會和文化層面對戰略決策的影響。

最後，荷姆斯也提醒讀者，即使圍棋或國際象棋的確提供了評價東方或西方行為方面的粗略估計，任何社會中也存在著抵消性的文化因素。文化是一個大雜燴，不是特點或影響的簡單列表。亞洲人喜歡包圍和控制領土嗎？當然，但他們也被證明容易接受西方的戰略寶典，尤其是克勞塞維茨的著作。決策者或戰略家可能擁有某些戰略偏好—亞洲人偏好地理空間方法和循序漸進，西方人偏好直接攻擊對手的面部—但某些情況也可能喚起隱性特徵。試圖辨別什麼樣的行動會激起對手什麼樣的反應，這要比單純從人們所玩的遊戲來推測其行為更具啟發性和知識性。⁷⁵這篇文章隨後也被香港《中國評論新聞網》所翻譯轉載。⁷⁶

即便是單從圍棋的角度審視，此一研究途徑也遭遇到限制因素。首先，圍棋基於對立的棋手遵守遊戲規則方能開展棋局並制定策略。大陸領導人按圍棋思路謀劃國家安全與利益策略，但能否有效端視對手是否按圍棋規則進行。因此，儘管北京領導人按圍棋

方策進行，但卻因對手不守規則而無法發揮預期功能。來永慶的文章即指出，中共領導人認為，美國應視臺灣為戰略累贅，因此必然會適時撒手；但美國卻出乎意料，未將臺灣作為討價還價籌碼，堅定支持臺灣超過60年。此即可作為其限制因素的一大註腳。

再者，如果中南海領導真的按照圍棋步術攻守進退，則路術很容易遭人看破手腳並進一步破解，這反不利於北京的安全與利益。這一點，武溫也在他的文章中建議，要破解中國大陸在南海的「圍棋戰略」，美國在亞太的盟國可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例如，首先越南可以為印度軍隊提供金蘭灣的海軍設施准入權，還可以將峴港空軍基地提供給美軍使用，這兩處都是越南在南海沿岸的重要戰略地點。如果北京並未理會，就可以將對抗行動擴大到給美日軍隊和海警提供金蘭灣和峴港的准入權。最後，如果中國大陸執意要將南海變成「後海」，越南、菲律賓、美國、日本和印度組成的強大聯盟就有必要重新調整這種力量失衡了。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圍棋是2D平面棋局，但無論是中美、臺海關係或是東海、南海領土糾紛，則屬3D層次交疊棋盤，並且其中關係錯綜複雜致令採取任何解決手段往往治絲而棼。美國戰略家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在他的《權力大未來》一書中指出，現

75 有關荷姆斯對於圍棋途徑的批評，參見James R. Holmes, “Maritime Southeast Asia: A Game of Go?”, The Diplomat, Dec. 20, 2014, website: http://thediplomat.com/2014/12/maritime-southeast-asia-a-game-of-go/?utm_content=bufferaafc8&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facebook.com&utm_campaign=buffer

76 「中國南海戰略體現圍棋思維？」，中國評論新聞網，2014年12月23日，網址：http://hk.crntt.com/doc/10353/9/3/103539319_2.html?coluid=59&kindid=0&docid=103539319&mdate=1223090025

今世界權力分布模式就像「一場複雜的三維國際象棋比賽」。在頂層棋盤上，軍事實力仍是單極的，美國的最高地位還將持續一段時間；但在中層棋盤上，經濟實力已經多極化，美、歐、中、日是主要競爭者，其他一些國家的重要性也在增強；底層棋盤是政府控制範圍之外的跨國關係領域，非國家行為體參與其中，權力廣泛分散。約瑟夫·奈認為，21世紀兩大權力轉移正在進行，一是權力在不同國家間的轉移，二是權力從國家行為體向非國家行為體的擴散，越來越多的問題超出了國家的控制力。⁷⁷

另一方面，西洋棋雖與圍棋有別，棋道卻有相似之處。季辛吉評價美國史上首位黑人總統的警語是：歐巴馬是一位「同時在下許多盤的棋子，開手第一著且能不落俗套(a chess player who is playing simultaneous chess, and he opened his game with an unusual opening)」，我國前任大使陸以正認為此一比喻得可謂恰到好處。⁷⁸此外，在以圍棋進行戰略文化分析時，背後往往有若隱若顯的文化優越感作祟，似乎圍棋的戰略思維更棋高一著。因此，圍棋的研究途徑容易造成文化上

的刻板印象問題。施道安指出，中國人認為他們的戰略傳統，不論就道德上或效能上均優於西方。中國大陸的戰略家們常強調文化的重要性，結果形成對美國及西方戰爭方式的刻板印象。⁷⁹

結 論

自1970年代以來，戰略文化研究途徑逐漸為人所重視。史奈德(Jack Snyder)即認為，戰略文化是國家戰略決策者對於核戰略指令或模糊博弈所共有的整體概念、制約性情感反應和習慣行為模式的綜合。⁸⁰布蘭德利·克萊因(Bradley S. Klein)甚至指出，戰略文化實際上是一種思維，是關於武力以及國家可以合法地使用武力，對付假定敵人的方式。⁸¹在兩岸戰略文化研究者方面，對於戰略文化的界定似乎也沒有太大的不同。例如我國已故戰略學者鈕先鍾指出，文化是一種概括性的概念，並以歷史、地理、社會、經濟等因素為根源，所表現出來即為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明瞭一國的民族性之後，始能瞭解其戰略思想。⁸²大陸戰略學者郭樹勇則認為，戰略文化是一個民族或政治共同體，實

77 Joseph Nye, *The Future of Power* (New York, NY: PublicAffairs; Reprint edition, 2011).

78 陸以正，「季辛吉論歐巴馬」，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安(評) 098-152 號，2009年7月27日，網址：<http://www.npf.org.tw/printfriendly/6189>

79 Andrew Scobell, *China and Strategic Culture*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2).

80 Jack Snyder,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Santa Monica: RAND, 1977), p.9

81 Bradley S. Klein, "Hegemony and Strategic Culture: American power projection and alliance defense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4, 1988, pp.133-148

82 鈕先鍾，*現代戰略思潮*(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頁23

穿其世界觀、戰爭觀與和平觀，帶有長期性和根本性的理念。⁸³

傳統戰略文化只是影響國家戰略行為的因素之一，它沒有也不可能取代戰略環境、戰略利益以及戰略實力，本身現實的因素針對戰略行為的影響。⁸⁴以圍棋作為對中國大陸戰略決策的研究途徑，的確具有啟發意義但不宜過度重視，因為以圍棋比擬中共戰略思維之說，將可能過於簡化中共戰略思想，其領導當局遵循棋局遊戲規則來經略世局，實在難以想像。美國海軍戰院中共海軍專家荷姆斯(James Holmes)教授指出，儘管運用圍棋有助於詮釋東亞情勢，以及中共與美國相互過招微妙關係，但要審慎觀察理論與現實間因果關係；例如中共近年欺凌鄰邦，以及阻

止他國海軍進出周邊國際水域，顯然不符圍棋旨趣。⁸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大陸宣揚自身「和平發展(崛起)」後，大陸戰略文化學界幾乎清一色地強調中國秉持和平的傳統思想，以及對主權大一統的堅持，上述論述與其說是研究，不如看做北京再打造形象與收復領土過程中的輿論戰環節可能更貼近現實。對此，筆者建議我國亦應重視戰略文化的研究，並釐清兩岸戰略文化之間的差別，以免遭到混淆與誤解。

作者簡介

吳建德先生，空軍備役上校，波蘭華沙大學(Warsaw University)國際關係研究所博士，現任職樹德科技大學副教授。



1931年10月5日完成人類首次不著陸橫渡太平洋的Bellanca CH-400維多小姐號(Miss Veedol)。
(照片提供：張詠翔)

83 郭樹勇主編，戰略演講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9-20

84 宮玉振，〈試論戰略文化傳統及其對戰略行為的影響〉，《中國軍事科學》，第6期，2001年，頁34。

85 Keith Johnson, "What Kind of Game Is China Playing?",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1, 2011, website: http://www.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259304576374013537436924?mod=googlenews_wsj&mg=reno64-wsj&url=http%3A%2F%2Fonline.wsj.com%2Farticle%2FSB10001424052702304259304576374013537436924.html%3Fmod%3Dgooglenews_wsj